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经济哲学的运用

郭劲光

摘要: 经济学与哲学有着不解之缘, 经济学要取得理论的发展就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 同样哲学要走出思辨的“象牙塔”也要回归到具体的经济现实中来。又由于经济学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其研究方法的变革与创新, 所以本文着重分析了近年来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演变态势和经济哲学在这一进程中的广泛运用, 希望能为解决经济学理论创新障碍的问题提供一条有效的、可行的思路。

关键词: 经济学 哲学 经济哲学 方法论 经济人

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困惑

经济学是基于现实又作用于现实的一门社会科学, 而方法则是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出发点, 它所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观察世界的尺度。因此, 要理解和把握经济学理论的进步与突破就离不开对其方法论变革的研究和思索, 我们认为从方法论入手来把握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 经济学发展至今, 之所以产生了诸多的“变革”和理论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研究方法的演变也同时体现了整个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所以澄清近年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是大有裨益的。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作为方法论在近年的发展中则主要是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之间的较量。这种方法论上的冲突贯穿于整个经济学演变脉络的始终, 也正是在这一冲突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学的发展, 实现了经济学从严格的而又切实际的假设出发转到了从科学出发, 通过大胆的猜想, 然后进行苛刻的反驳, 使经济学理论得以不断向前推进。根据里德曼(Redman)的统计, 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 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关于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 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哈兹(Hands)1991年总结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成的13个共识点中, 就有7个和证伪主义直接相关。所以, 布劳格概括说: “证伪主义者, 整个20世纪的故事。”

经济学家在近年的研究中似乎更加注重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而且这也正在形成一种研究潮流——经济学的数学化。客观地讲, 数理方法的引入的确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它使得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加简洁、清晰, 其推理更加直观方便, 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但是关于数学的运用历来是有争议的, 一种观点认为, 数理方法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 认为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 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他们认为从经济学运用了数学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甚至认为数理方法的运用使经济学具有了科学的形式。马克思曾经提到: “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 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而另外一种观点则恰恰与此相左, 认为经济学终究不是数学, 经济学所关注的经济现实和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即使可以列出经济的函数, 尽管可以尽可能地概括现实的重要因素, 但这仍然是十分不够的。这里不仅是由于人的活动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相互冲突, 更多的是由于在经济学

的公式中总是存在着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也可能是经验的, 也可能是“推测”的, 甚至是“想象”的。这种情况也就使得经济学中所要研究的经济关系无法转换成明确的定义, 导致检验性的降低或根本没有可检验性, 这种情况被克兰特(Klant)称为“参数悖论”, 这也是所谓“卢卡斯批判”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说先验主义尽管有它在科学研究中的意义, 但是却难以真正地被现实所验证。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 将经济规律分为三类, 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 并指出: “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 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这也说明了, 函数分析并不能用量的分析来完全替代因果关系的研究。

经济学在上个世纪的演变发展中还出现了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围开始逐渐地超出传统经济学分析范畴的现象, 经济分析的对象相应地扩张到了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 小到婚姻、家庭、犯罪等, 大到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有人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帝国主义”。相应地研究方法也随着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而发生了转移。比如, 198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 将国家和政府作为一种“政治市场”而纳入经济分析之中, 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横跨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政治学(表决制度的比较研究)、社会学(行为逻辑研究)和哲学(自由概念的逻辑分析)。他们研究了政治制度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 研究了官僚主义经济理论、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 并对国家与市场的本质和关系进行了再定义。通过对这些领域的研究, 他们认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制度和政治挑战, 原因是, 现行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即公共选择机制并没有新意。阿罗定理显示没有一种投票制度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沟通个人和集体, 应设计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表现民主的新方式, 以阻止行政官僚主义的继续发展, ……由于存在种种‘政府失灵’, 因此, 市场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

另外, 新制度经济学使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又一次得到了复兴, 使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也被纳入了微观经济分析之中, 并成为经济学中逐渐居于一定主导地位的独特的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以康芒斯、凡勃伦、哈耶克、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和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扩展了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假设条件, 而将制度作为变量, 把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引入了经济理论的研究, 建立了更为接近现实经济活动的方法论。他们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 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历史分

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这种方法论具有很强的“非纯粹经济分析”特征,西方正统经济学家虽然也承认非经济变量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但他们在方法上,为了精确、完整地进行纯粹经济分析,总是假设这些变量对经济过程不发生作用,假设制度是既定的。由于对经济活动作了这样的简化,因而他们所关心的经济行为是人们如何利用有限资源去进行生产,但是制度分析方法却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由于制度分析方法坚持了这种信念,所以他们关注的是经济系统整体,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那些经济因素,又考虑那些非经济因素,并把那些诸如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当中,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突破。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使西方经济学实现了对诸如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经济史等方面研究的深入,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制度革命”,近年来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无法形成的。但是,同样也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分析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而被公认的成熟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许多经济学家对“科斯定理”零交易费用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巴泽尔就曾批评诺思说,由于民族和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状态之中。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就是,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均衡分析方法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这种分析方法假设各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目标最优化而相互作用,最终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从而系统的演化模式被描述为逐渐趋近并达到均衡。在外界“力量”发生变动时,则在均衡附近波动,或准静态地转移到新条件下的稳定均衡,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均衡状态来大致确定经济发展的整体变动趋势。但是随着系统科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耗散理论、协同学、超循环论、分形学、混沌学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自组织理论或者说现代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使得人们在“世界简单性”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念正在日趋解构¹⁰,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任何看似简单的事物后面,都隐藏着惊人的复杂性,因而以往对事物机械的、还原式的、线性的解释都是对事物存在和演化的一种曲解,这给经济分析带来了更大的难度。一方面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包含了许多的变量和参量,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一幅非线性的图像。这是一个高维的系统,要对这样多的变量和参量进行分析和计算,不仅在实际上行不通,而且其计算的结果也很难检验;另一方面,经济系统有很多的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有自身的结构,都有按其经济结构的性质实现它自身功能的性质,但各个层次的经济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这种层次之间的利益协调就成为经济系统复杂性本质的根源之一。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使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非均衡演化的经济现象,再用原有的经济理论来解释现实世界必然会遭到质疑,经济学正面临着“经济学危机”。因此,经济分析理论上的革新就显得非常的迫切。这就引出了我们在下面将要讨论的经济哲学在解决经济理论创新障碍方面所起的作用问题。

二、经济哲学的运用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传统范式在今天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在市场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和信息非对称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和撞击下,其局限性愈加明显。人们在不断地追问:每个关于经济现象的陈述能否都可以直接还原为关于个人经济行为的陈述;经济行为本质上能否归属单纯的理性计算;在信息非对称的经济世界里,最大化目标能否完整地实

现;在决定经济的各种因素中,非经济因素有多重要,怎样处理这些非经济因素等等。这些问题单靠经济学本身是无法解决的。笔者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哲学的兴起正是对人类步入智能化时代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发展规律进行哲学层面反思的产物。其实,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历来就存在着不解之缘,二者是“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的”¹¹。

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和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世时是以一位“道德哲学教授”的面貌出现的,他一生撰写了两部惊人的著作,第一部《道德情操论》谈的是道德问题,第二部《国富论》谈的才是经济问题,他的古典经济学就是从道德哲学中分化出来的。我们说,正是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哲学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曾考察了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前提,指出笛卡尔和培根的哲学,尤其是笛卡尔的哲学使经济研究摆脱了古代的神话和迷信。“但一般说来,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后来洛克成为了英国、法国、意大利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的‘哲学家’。”¹²惠特克也认为霍布斯、洛克和休谟“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哲学基础”¹³。新古典主义兴起之后,在“经济学的哲学”这一框架内,以科学方法论,尤其是社会科学方法论为重点,形成了哲学与经济沟通的桥梁,在这一概念下对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与争论,基本上是在实证主义思潮的范围内进行的,同实证论传统下的科学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纳维利·凯恩斯(J. N. Keynes)在1891年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中,曾断言经济学必须“以观察开始,以观察结束”¹⁴,他把经济学看作是一种“价值中立”的事实科学。

后来对新古典主义持批评态度的经济学家对于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说提出了异议,把事实和价值这一哲学问题引入了经济学的理论争论之中。其中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她在《经济哲学》一书中指出:“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一套规则,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为它们辩护,需要一种个人的良知促使他们去实践它们,……除非社会成员对如何处理事件的恰当方法有共同的想法,否则,社会将无法存在,而这些共同的想法是通过意识形态来表达的。”¹⁵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提供人们追求的目标”,其中包括“道德标准”和“政治生活方案”。据此她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制度的学科,一方面是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具有实证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总是每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在她看来,正是这些“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构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说的“前提”和“基本假设”。这就是说,各种经济学说,事实上都有哲学的前提蕴含其中,既包括方法论的前提,也包括伦理学的、价值论的和社会哲学的前提。在当代,对于经济学说中所蕴含的社会哲学、伦理学的前提的研究,不仅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同样也引起了哲学家的兴趣,从中引出了经济哲学的许多问题。其中,有些学者指出,不仅科学方法论、伦理学和社会哲学等与经济学说有着内在的关联,甚至像宇宙论这样的哲学学科对经济学说也有深刻的影响¹⁶。

现实经济活动既属于经济学范畴,又属于哲学范畴。在许多经济学大师的著作中,经济学思维与哲学思维交融在一起,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经济哲学的研究才方兴未艾,它不仅有利于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同时也有利于哲学走出它思辨的“象牙塔”,回归到现实的经济世界中来,从中获得自身发展的思想养料和生命活力¹⁷。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也有很多,比如:L·鲁滨逊的《经济哲学》,L·麦斯的《经济学认识论问题》,A·罗森布尔基的《微观经济规律:一种哲学的分析》等。经济哲学要研究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也要对社会经济的历史进程进行哲学反思。比如哈耶克,就是通过认识论的论证来证明其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同样

经济哲学在解决其他经济难题时也有很大的有用武之地,如解决经济全球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单一的财富追求所造成的人的异化问题以及突破“经济人”的纯理性假设进而解决社会经济行为中存在着的非理性问题等等,凡此种种,都需要经济哲学的不断深入和研究。如果我们不能以客观、全面、辩证的哲学眼光来审视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果经济的发展缺乏哲学发展理念的索引,缺乏理性的设计和整合,缺乏哲学思想的贯穿与提升,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就不可避免。总之,哲学可以帮助我们从事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生活底蕴,更深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下面着重以“人性假设”为例,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三、“人性假设”的再修正

马歇尔认为,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近代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特别是经过“边际革命”,逐步将其理论建立在“经济人”或“理性”的基本假设上面。有了“理性”的假设,经济学家便致力于建立经济学的更加简化也更加精美的数理体系。以阿罗和德布鲁为代表的经济现代体系便是一个例证,它不仅抽象掉了市场运作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结构,更重要的是,“经济人”假设也使经济人的意识形态不再进入经济分析的范围,以致于我们今天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市场制度总是有效率的。其实,这个结论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界所兴起的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不满与批评,以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思潮,正在逐步改变人们对市场制度的认识。诺思教授曾说过,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¹⁶。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不过是工具理性、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思想的经济学术语。在这种假设下,经济人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做出理性的最大化计算,而价值、信仰、道德和情感则都被排除在经济分析的框架之外。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自私的经济人假设将丰富的人性概括为自利的精明计算等,虽然在特定意义上有利于经济学家进行逻辑分析,但同时也使经济理论日益脱离现实的经济生活,并且缺少应有的人文内涵。

“理性当然是重要的,但理性只要求人们能将备选对象连续地进行排序,并从中择取最佳者,……如果人人自私,他们便难以相互信任,……这不仅是无道德的,而且是无效率的。”¹⁸经济学数字化依靠数学模型来进行“演绎”,结果过份地将人们选择与交易问题加以抽象与简化,全然忽视了对于人的本性的研究。其实人类的本性,意识在解释当事人的行为方面,特别是在解释除自利动机之外的其他行为动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组织理论、制度理论、履约理论等很多方面都是很有用处的,但人们往往没有对它引起足够的重视。

早在20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就敏锐地思考了有关人的哲学,他指出,除了在一一切生物种属中都可以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以发现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第三个系统——“符号系统”。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人类生活。有了它,人类就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这一符号宇宙就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和科学等。由此,卡西尔修正和扩大了自古希腊以来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古典定义。他指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

新路——‘文化之路’。”²⁰卡西尔指出,有关人的本性的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理解为一种实体性的定义。人性有一个逐步展示的过程,那就是“理性的动物”、“合群的动物”乃至“政治人”、“经济人”等等,这些都是人性展示的不同方面。这些不同的人性面,构成了人类的共同本质,即“文化人”²¹。在“文化人”的假设条件下,经济活动最重要的资源不再是以往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而是知识。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说:“知识已经变成了关键的资源,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种资源,这一改变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它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它创造了新的经济动力。它创造了新的政治学。”²²

总之,哲学是人对自己社会存在的抽象,可以说哲学关注经济问题也是其自身内在的要求,哲学与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研究经济问题不能不研究其中的哲学,研究哲学又不能不以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状况为前提。从经济学角度讲,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对于解释当前的社会经济活动已有无能为力之感。所以,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考虑,我们认为一方面要自觉地从经济学研究或经济活动中凸现出哲学因子,把握其内在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哲学的研究又要以反哺的形式积极地关注现实,复杂的经济问题客观上需要经济的哲学反思和哲学方法论的介入。曾经有人这样来说哲学、经济学和文学:哲学求“真”,文学惟“美”,经济学则从“善”。没有哲学给予的方法指导,经济学将寸步难行,没有文学的浪漫色彩,经济学将晦涩枯燥。

注释:

张旭:《20世纪经济学解析》,163、1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661~6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波]奥斯卡·兰格:《政治经济学》,中文版,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George J. Stigler, 1984 Economics——Imperial Scien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6, No. 3, pp. 301~314

[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文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中的制度》,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强天雷、任保平:《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方法述评》,载《经济评论》,2001(3)。

10 彭新武:《复杂性探究方式与经济学》,载《社会科学》,2001(2)。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4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4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 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10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4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9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5 Joan Robinson, Economic Philosophy, pp. 13~14

16 赵修义:《经济学和哲学的内在联系》,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2)。

17 罗仕清:《论经济哲学的当代走向》,载《社会科学》,2001(2)。

18 19 张军:《道德:经济活动与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变量》,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2)。

20 卡西尔:《人论》,中文版,3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1 黎红雷:《人性假设与人类社会的管理之道》,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2)。

22 德鲁克:《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见《知识经济》,59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大连 116023)
(责任编辑: N)